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四期



总主编 乐黛云 杨慧林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World Literatur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四期

主编 陈跃红 张 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四期/陈跃红,张辉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301-23648-2

I. ①比… II. ①陈…②张…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世界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②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5468 号

书 名: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四期)

著作责任者: 陈跃红 张 辉 主编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648-2/I·269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mailto: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2.25 印张 280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主 办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承 办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

合 办 (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总 主 编 乐黛云 杨慧林

#### 学术委员会

乐黛云 杨慧林 饶芃子 严绍盪 曹顺庆 谢天振 孙景尧  
钱林森 王 宁 叶舒宪 陈跃红 高旭东 张文定 刘小枫

主 编 陈跃红 张 辉

副 主 编 张 冰 张 华

#### 编辑委员会

陈跃红 程爱民 耿幼壮 胡继华 刘耘华 秦立彦 宋炳辉  
魏崇新 王柯平 王宇根 徐新建 张冰 张华 张辉 张沛  
张旭春

#### 海外编委

Rodulf G. Wagner(海德堡大学) Haun Saussy(芝加哥大学)  
David Jasper(格拉斯哥大学) Federico Masini(罗马智慧大学)  
Gilan Tihanov(伦敦大学)

编辑部主任 张 冰

编 辑 黄瑞明 初艳红 杨 果 靳成诚 徐 超 高华鑫

# 目 录

编者的话 ..... 陈跃红 张 辉( 1 )

## 学术焦点

主持人语 ..... 戴从容( 1 )

“直到汉与匈的消亡”

——乔伊斯,中国和种族化的世界史 ..... 芬·福德姆( 3 )

Asia Was, Laozi Is, Plurabelle to Be: China and

Japan through Joyce's "Cracked Looking Glass" ..... 伊东荣志郎( 16 )

Anna Livia Plurabelle's "River-Speech" and

*Finnegans Wake*: A Life Force and A Textual Force ..... 田恩卿( 35 )

《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准对应中文文本 ..... 曾丽玲( 42 )

## 批评空间

沃格林的《柏拉图》 ..... 林国华( 48 )

《法礼篇》中的喻说与哲思 ..... 王柯平( 55 )

经典的美学特征

——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经典”理论再解析 ..... 金永兵( 71 )

叠印:斯特林堡式场面调度(从戏剧到电影) ..... 孙 柏( 81 )

新世纪的几部西方文学史研究述评 ..... 韩加明( 89 )

## 异邦新声

充满活力的杰姆逊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访谈录 ..... 史岩林译( 97 )

巴赫金的小说论(1935—1941):

巴赫金小说论的知识背景和独创性研究 ..... G. 提哈诺夫(105)

## 青年园地

“儿童的发现”与文学诸问题

——试论中日现代文学中的“童心”观念 ..... 高华鑫(118)

## 主持人语

### 戴从容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一开始在乔伊斯的笔下，他也像 20 世纪初期众多没有到过中国，只靠着《中国纪行》这类哗众取宠的“游记”来理解中国的西方人一样，把中国简单地想象为皇帝统治下的异教徒社会，一心只想着鸦片，觉得白人身上有一股尸体的味道。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曾借一位水手之口，把中国描写成人人会变戏法，会炖老鼠汤喝的怪异民族。事实上那时的中国对乔伊斯来说只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一切与自己不同的“他者”。

但是这个印象随着乔伊斯对其他民族的关心而发生了改变。这个变化不是乔伊斯早年相信的顿悟(epiphany)式的，而是在与周围的中国人的交往中，在对真正的东方著作而不是二手文献的阅读中逐渐获得的。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乔伊斯对东方的描述依然说不上深刻，但已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怪诞滑稽。这表明两个文化的相互理解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解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但是却可以通过不断深化而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宽容和善意。

英国学者芬·福德姆和日本学者伊东荣志郎都注意到《芬尼根的守灵夜》中闪和肖两兄弟形象中包含的中国与日本的冲突，以及这一对立呼应着爱尔兰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冲突。不过非常有趣的是，作为欧洲人(虽然是爱尔兰人)的福德姆倒更关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被戏仿的历史上的“东方主义”，即欧洲人将中国人视为蛮族，因为担心“黄祸”而梦想着汉人的消亡；而作为亚洲人(虽然是日本人)的伊东荣志郎则更看重乔伊斯试图通过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来提供一种中日可以在其中和平共存的“人类世界史”。欧洲研究者的反躬自省和亚洲研究者的执着蓝图，正是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两个阶段，没有自省无以走出自身的局限，没有信心无以走向相互理解。

理解异国文化是一个永远不会穷尽的过程，在这个方面，译介和研究是比较文学为文化交流所筑轨道的两条钢轨。《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翻译与芬·福德姆和伊东荣志郎对书中中国意象的研究一样，都是希望为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搭建渠道。台湾大学的曾丽玲教授指出《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译本与德里达的《丧钟》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印证了不同文化在思想上的暗合。《芬尼根的守灵夜》在英语世界也以艰涩著称，但这不妨碍它成为影响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同样，《芬尼根的守灵夜》被译介到中国也许会有暂时的水土不服，但是正像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坚信的不同文化之间有着相通之处，《芬尼根的守灵夜》与中国的译入语文化在相互作用中也必然都会有所改变。

《芬尼根的守灵夜》描写了一条河，它自己也是一条河，一条充满着无限生命力量的河。正如韩国学者申恩景教授注意到的，乔伊斯在书中赋予了这条河巨大的变化力和可塑性。从这一点说，乔伊斯早就用这部融合了六十余种语言的作品预言了文化交流必将带来的改变，这个改变已经像河流般流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且也将像河流般奔流不息。

# “直到汉与匈的消亡”

——乔伊斯，中国和种族化的世界史

芬·福德姆

陈莹译

**【内容提要】** 在一战后全球对整体叙述的要求这一语境下，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不但呈现了世界历史的纷争，而且呈现了种族化的世界历史如何把中国脸谱化。本文分析了乔伊斯如何通过使人物和叙述类型增殖，而不是消解它们，来揭示出世界历史结构的缺陷。要颠覆性地揭露世界史的局限，关键是扩展性的叙述，而非排除性的叙述。

**【关键词】** 詹姆斯·乔伊斯 《芬尼根的守灵夜》 世界史 中国

## “Until Hanandhunigan’s Extermination”: Joyce, China and Racialised World Histories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new global imaginary which required new global narratives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Joyce not only staged a world historical conflict in *Finnegans Wake*, but also showed how the stereotypical roles given to China in racialised world histories found their way into *Finnegans Wake*. The central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Joyce engages critically with and against the structures of world histories not through a dissolution of character and narrative types, but through their proliferations. The proliferation of narration rather than its expulsion is key in the subversive revelations of the limitations of world histories.

**【Key Words】** James Joyce *Finnegans Wake* world history China

1922年末，詹姆斯·乔伊斯那部被禁的“两个种族（以色列—爱尔兰）的史诗”搅乱了欧美文化知识界，他自己却获得了充分的信心，或者说野心，将叙述转向了一个更大的主题：人类种族。<sup>①</sup> 乔伊斯对他的赞助人哈里特·肖·韦佛宣布，他要写一部“普遍的历史”<sup>②</sup>。我认为，乔伊斯是在创造大历史的趋势下突然转向于此，这种倾向也同样影响了众多出版人和作家，比如 D. H. 劳伦斯、埃兹拉·庞德、约翰·巴奇、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还有受到更大影响的 H. G. 威尔斯。第一次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一战显然已经结束，国际联盟也建立了起来，多个国家签订了凡尔赛和塞夫尔条约，这些大事件导向了一种要求整体叙述的全

<sup>①</sup> 詹姆斯·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集》，斯图亚特·吉尔伯特编，伦敦：Faber and Faber 出版公司，1957年，第146页。

<sup>②</sup> 帕特里夏·哈金斯：《詹姆斯·乔伊斯的世界》，伦敦：Methuen 出版社，1957年，第140页。



球构想。在似乎是达到高潮的1924年,指向世界史的文章标题层出不穷。<sup>①</sup>正如1905年到1907年任爱尔兰事务总管(Chief Secretary of Ireland)的布莱斯子爵在1919年的发言中所说的(这也可能是乔伊斯所想的):

这是地球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的居民变为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每个部分都被其他部分的命运所影响……因此,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可以书写世界史了。<sup>②</sup>

与创伤和恢复这类问题有关的话语为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世界史在被暴力释放和煽动的话语中被大写,尤其当暴力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中心的时候,在那里资本可以传播这些话语。类似的事件在世界贸易中心遇袭之后也发生了,于是萨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世界历史理论又重新被提及和讨论。<sup>③</sup>一战期间和战后对于阐释性叙述的需要产生了意识形态间的竞争:保守派的、自由党的、费边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的,还有女性主义的世界史出现了。一些(但绝不是全部)战后的文章标题是为学校教学准备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将出版人对说教课本的要求和知识分子对微妙且复杂的描述的需要视作来源于不同的领域。他们的解释也许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与学校教科书的乐观主义格格不入,教科书认为学生应该获得“一些社会发展的概念,并意识到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是向前发展的”<sup>④</sup>。尽管如此,他们却拥有共同的出发点:正是那些构成主要纷争的东西——一战和战争爆发的条件,推赶着“现代主义”不断前进。因此,乔伊斯的世界历史计划是世界史话语的有机组合的一部分。这套话语的理论也可以在维柯和黑格尔的论著中找到,乔伊斯也认同这些理论依据。本文考察了这样的世界历史被种族化的方式,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早期构思中呈现了世界历史的纷争,在这里他转向远东以扩大全球视野。作为乔伊斯东方转向的更进一步的背景材料,我将在种族化的世界史和维柯及黑格尔的作品中考察中国是如何被关注的。把乔伊斯放入世界史话语的语境中,强调了差异和文本间多元的可能性。我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案例(并关注中国自身的权益),展现出在种族化的世界历史中中国被赋予的模式化脸谱如何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得以表现。这一章的核心是乔伊斯对世界历史结构的批判性参与和反对,他通过使人物和叙述类型增殖,而不是消解它们,来揭示出世界历史结构的缺陷。

① 这些叙述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按时间顺序排列)M. W. 基廷, N. L. 弗雷泽:《世界历史介绍》,伦敦: A and C, Black, 1916年; J. B. 博茨福德:《世界简史》,伦敦: Macmillan 出版社, 1917年;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格式塔和现实》,慕尼黑: C. H. Beck 出版公司, 1918年; 布莱斯子爵:《世界历史》,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19年; 厄内斯特·施尔特:《世界历史介绍》,伦敦: Waverley 书局, 1920年; E. M. 威尔莫特·布克斯顿:《世界简史》,伦敦: Methuen 出版社, 1921年; 莱斯利·西威尔·史密斯:《世界历史主流》,伦敦: Revingsons 出版社, 1922年; 赫顿·韦伯斯特:《世界历史》,伦敦: Health 出版社, 1922年; 阿尔弗拉德·巴尔顿:《给劳工的世界史:一个从时间伊始时被剥削者立场出发的人的行为的故事》,伦敦: Labour 出版公司, 1922年; 约翰·巴乔编:《当今的国家:新世界历史》,伦敦: Hodder and Stoughton 出版社, 1923年; 玛格丽特·科尔:《世界史介绍》,伦敦: Labour 研究系出版, 1923年; H. G. 威尔士:《世界简史》,伦敦: Cassell 出版社, 1922年; 吉尔伯特·T. 赛德勒:《简而言之的世界史》,伦敦: C. W. Daniel 出版社, 1924年; F. J. C. 赫恩肖:《第一部世界历史》,伦敦: Macmillan 出版社, 1924年。

② 布莱斯子爵:《世界历史》,第4页。

③ 萨缪尔·P.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评论》,伦敦: Simon & Schuster 出版公司, 1996年。

④ 韦伯斯特:《世界历史》,第三章。

## 世界历史中的种族

种族化和对人类多样性的种族意识被诊断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特征。19世纪前对世界史的叙述同样促进了这种意识的形成。种族主义和种族差异论在世界史上独霸的原因很明显：首先，叙述者通常认定种族主义可以成为一个群体被历史选中——或值得被选中的合理解释。比如，在宇宙论和神学的框架下，《旧约》对犹太人（或者犹太“族”、犹太“国”）历史的讲述。在《创世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毁灭性惩罚的叙述策略是如何被用来解释世界上明显不同的种族的存在，比如大洪水和唯一幸存的父亲诺亚。诺亚之子，闪、含和雅弗继承了他的世界里的不同部分，这将被当作一个神话来架构和解释三个主要的“种族”：黑种人、白种人和黄种人，以及他们是如何被世界历史区别对待的。<sup>①</sup> 诺亚之子也可以用来解释白种人中的三个类型。赖因·普拉特正是从“诺亚”历史叙述传统审视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乔伊斯对这一问题的处理。<sup>②</sup> 这样的历史叙述希望解释人类社会的的不平等。布莱斯的《世界历史》(1919)就是此意识的典型论调：“我们欧洲的血统享受着许多继承来的好处，在现在的赛跑中与其他人拉开了距离。但这将会是一次漫长的比赛，他们中的一些也许会赶上我们。”<sup>③</sup> 布莱斯无力的双关语在乔伊斯的故事标题“赛车之后”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在欧洲人的赌局中赛车的失败是作为“欧洲最落后的种族”的标志。<sup>④</sup>

其次，世界史的形式产生了精减的必要，创造粗线条的事件而不是描述例外和复杂的细节。因此，在既有原则基础之上对元素进行选择很有必要，这样一来，一些特定的纪念物、文件和事件就被边缘化了，因为他们不足以对说明历史“主流”做贡献：比如，爱尔兰就是个典型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中，它过于边缘化而未被关注。J. M. 罗伯特的《世界历史》(1976) (I. R. 摩尔称为不可超越之作)中写道：“迷人尤卡坦半岛……津巴布韦的毁灭……复活节岛的神秘雕塑，始终待在世界历史的周围。”<sup>⑤</sup> 罗伯特表示，文明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点是合理的。这样，带着对特定现象的叙述，比如彻底拒绝的、排除的、乐观的、建设性的，羞耻的和恬不知耻的叙述就可以被创造出来。在1924年，甚至有理由将中国排除在“当下将创造出‘欧洲文明’（我们研究的主要目标）的主流努力之外”。<sup>⑥</sup> 相比之下，D. H. 劳伦斯的历史——虽然仅仅关注欧洲——却记录了中国人对于欧洲历史基本层面的原初影响。比如，中国人成功抵御了3世纪蒙古人的侵略，“匈奴转向了西方”，继而导致了古罗马的灭亡。<sup>⑦</sup> 排除在外并不是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它反映出有一个有缺陷的观念：世界史基本上等同于欧洲史，这种观念广泛流

① 种族三分的理念绝不是普遍的：通俗科学的作者和达尔文主义者路易斯·菲吉耶在1872年的著作中将人类种族划分为“白种人种、黄种人种、棕色人种、红色人种和黑色人种”。对此也可参见桑德勒的相关章节。

② 赖因·普拉特：《乔伊斯、种族和〈芬尼根的守灵夜〉》，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30页。

③ 布莱斯子爵：《世界历史》，第20页。

④ 埃尔斯沃兹·梅森、理查德·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评论集》，纽约：维京出版社，1964年，第70页。

⑤ J. M. 罗伯特：《世界历史》，纽约：Knopf出版社，1976年，第八卷，参见I. R. 摩尔：《世界历史》，见M. 本特利编：《历史编纂学读本》，伦敦：Routledge，1997年，第952页。

⑥ 施尔特：《世界历史介绍》，第13页。

⑦ D. H. 劳伦斯：《欧洲历史的发展》，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21年，第66页。

传,并催生出更多对种族优越性的叙述。当能从丰富的史料中选择如何叙述时,世界历史也同样要填补史料不足的空白——尤其是那些较早的记录中的裂缝。

这些裂缝不一定导致种族主义,但这些空白却能促进一些理论,阐释其中可能发生了的事情,19、20世纪的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填补这些空白的理论。由于尊敬种族主义,世界历史获得了一个坏名声。I. R. 摩尔于1997年将种族主义描述为“狂热分子,假木偶和鼓吹家中多变的工具”。他呼吁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世界历史重新崛起,并指出这种边缘化来自一种对“宏大和邪恶视角的结构的恐惧,历史学家将这种结构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sup>①</sup>。但是这种结构之所以过时同样也与历史上不能避免的欧洲中心的种族化和种族主义相关。种族和它们的“旁支”和“宗族”常常好像戏剧演员,具有固定特点,甚至既定的命运,在一种展开的叙述中扮演他们的角色。在世界史的种族戏剧层面,黑格尔具有重要的地位:“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步都有固定的原则,在历史上,这些原则是精神的特质——罕见的民族天才……那种或这种特质构成了一个人的特殊才能,这是我们要询问的,也是必须……被历史证明的。”<sup>②</sup>布莱斯的思考也与此相应:“在文明的源初,一个平静却显著的变化成为了一个稳定且被明确界定的族群的结构,每个族群都有显著的情感和精神的特点,它们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民族特点……这些族群……如何进化却是一个模糊却引人注目的问题。”<sup>③</sup>威尔莫特·巴斯顿在她教科书的开篇展现出一个使人联想到乔伊斯的“纪念馆/缪斯屋”<sup>④</sup>的意象:

设想有一段足够长的饰带来环绕地球,在上面我们也许会注意到男人和女人的形象……带有典型的种族和时代特征的男人女人。有时他们促进种族向共同的目标前进,有时他们成为阻碍……但整体上总是向一个目标前进,那个目标就是人类的幸福。<sup>⑤</sup>

为了书写世界历史,乔伊斯面临着被归入某个种族话语类型的风险,“人物”(种族偏见)和“叙述”(殖民,帝国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的重复)的问题将会加重这种风险。但是,乔伊斯并不拒绝“人物”和“叙述”中的任何一个。他与这些类型和偏见合作,通过它们迅速地构思,然后将让它们在碎片化叙述的重复海洋中漂浮。这其中的风险并不因消解了“人物”和“叙述”的负面意义而减轻,而是恰恰相反:通过与它们的深入接触而缓解。要颠覆性地揭露世界史的局限,关键是扩展性的叙述,而非排除性的叙述。

## 乔伊斯对世界史纷争的表现

乔伊斯将爱尔兰作为他的六七张底稿的背景,开始了他对世界历史的书写。在第四张

① 摩尔:《世界历史》,第942—943页。

② G. W. F.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J. 希伯列译,伦敦:George Bell and Sons 出版社,1888年,第66页。此后引为“LPH”。

③ 布莱斯子爵:《世界历史》,第17页。

④ 詹姆斯·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伦敦:Faber and Faber 出版公司,1964年,8.9,此后引为“FW”。

⑤ 威尔莫特·布克斯顿:《世界简史》,第1—2页。

底稿中的伯克利——帕特里克辩论是一个特例，因为这是乔伊斯第一次将远方世界中地理的、政治的和语言学上的回音编织进来。由此，乔伊斯触及了全球想象的边缘，将他的视野设定为“世界文学”的在场<sup>①</sup>，这个经典的文学学术语自歌德提出以来就引来不断的讨论。乔伊斯在其中一张底稿中将“普遍历史”视为“描述了爱尔兰使圣帕特里克皈依”<sup>②</sup>。它讲述了一个具有预言能力的异教牧师和一个务实的基督教传教士之间荒谬的相遇。乔伊斯根据公元432年爱尔兰大德鲁伊主教鲁赫鲁（他的理想主义因与伯克利相关而被强调）与英国出生的圣帕特里克的历史性相遇来给这些人物类型分级。这次相遇围绕一个关于视野与颜色的哲学论辩展开，它植根于一种混杂的、部分来自于中文的美拉尼西亚语。乔伊斯将一份副本寄给了韦弗：<sup>③</sup>

宾伯在神的洋泾浜人鲁赫鲁·伯克利上面，爱尔兰亲亲神的大德鲁伊，穿着他的七重消色七重色彩的……披风，他给客人帕特里克展示了……太多造物主的多彩的泛显灵世界的幻象，从矿物到植物再到动物所组成珊瑚的装饰，似乎在一起也没有满足堕落的人，而是在阳光下几个爱尔兰等级的照片反射的下面……展示它自己……不能吸收。

帕特里克不懂伯克利的意思，于是伯克利解释说，所有不同色彩的物体事实上都是绿色的影子。比如说：

因战争获得的紫色的创伤的至高无上的大独裁者全身整齐地涂染了很多如同你看到的番泻树的神的颜色。<sup>④</sup>

“如果读我的东西有任何困难”，乔伊斯曾说，“那是因为我使用的材料……我的思想通常是简单的。”<sup>⑤</sup>透过术语和洋泾浜的面纱，我们可以看见“joss pidgin fella”（神的商人），伯克利主教指出“堕落的人”面前出现的世界的幻象，它们被一组差异明显的色彩区分出来，然而在现实中，一切物质都具有一种因内在本色造成的整体性。伯克利提出，各种色彩构成的混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绿色——我们要考虑到辩论恰巧发生在爱尔兰，在三叶草绿的天主教爱尔兰开始之时。与帕特里克肤浅的认知不同，伯克利主教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一个“一”。正如文森特·程所说，伯克利的“相对多元论”产生了一种色盲，它看不到导致了种族的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别。<sup>⑥</sup> 乔伊斯的世界历史将展示出这几种认知之间的冲突，它们如同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一样。

韦弗一定感到非常困惑，于是表达了她对此构思的失望，所以，乔伊斯在接下来的回信中说：“我很遗憾帕特里克和伯克利没有成功地表达他们自己。我想，这个答案将是派迪·

① 见大卫·达姆罗施：《世界文学是什么》，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麦克·格勒顿等：《詹姆斯·乔伊斯全集》，纽约：Garland出版社，1977年，第63卷，146e。

③ 乔伊斯有些洋泾浜词取自奥托·耶斯佩森的《语言：本质、发展和起源》，纽约：Henry Holt出版公司，1922年。包括“joss”，“chinchin”和“chowchow”——意义为“神”、“问候”和“混合保存”或“食物”。“joss”和“pidgin”被认为是中文“deos”的翻译和英语中的“商业”一词。见此书的第222页。

④ 格勒顿：《詹姆斯·乔伊斯全集》，第63卷，146e。

⑤ 弗兰克·巴金：《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产生》，伦敦：Granson & Grayson出版社，1934年，第291页。

⑥ 文森特·程：《乔伊斯，种族和帝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迪格纳穆的幽灵：轮回。或者（在黑格尔和维柯之后）四位杰出的编年史家建立的历史理论也许能部分表达我的意思。”<sup>①</sup>无论这些理论是什么，就像我前面写的，乔伊斯将之归于“那些乏味的、重复的、怀旧的、消极的、说教的四个老人”，他们醉酒后以一种模拟历史形态的相似物来重复自己（无论这是不是那类黑格尔的辩证法或者维柯的时代循环），他们的重复贯穿了整个世界史的叙述。<sup>②</sup>乔伊斯非常关注相关的讨论，将这些讨论描述为“对于此书本身的辩护和证词”。<sup>③</sup>当乔伊斯修改了后三十章的片段后，我们更能明显地辨认出帕特里克的日本人身份，这样乔伊斯就可以把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的冲突编织进来。<sup>④</sup>他思考着：

让两个男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的一个酒吧里彼此交谈难道不是一件矛盾的事吗？但是，它却又是表达强烈冲突和不能化解的对立的一种理性和客观的方式。<sup>⑤</sup>（原文为法语）

胜利的殖民者和溃败的被殖民者之间的相遇成为世界史叙述的主要内容。我们如何把这一段与中国在一个种族化了的世界史中的角色联系起来呢？我准备通过四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对殖民的和民族的历史编纂学的倒置；对文学方言的使用；把东方和西方当做代表着两种对立观念的辩证性；最后还有对超历史学的分层和重复的运用。最后一个层面也将导向简要讨论《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世界史模式，在“预先重复”的时候为什么总被理想化。

首先，圣帕特里克是被爱尔兰改变了信仰，而非改变了爱尔兰的信仰。乔伊斯对圣帕特里克改变信仰的重新解释颠覆了典型的殖民编年史学，因为在典型编年史学中，殖民传教士使野蛮的当地人改变信仰，或者说交易人造就商人，权力全部导向一方，而被殖民者被剥夺了任何力量。海拉·辛格联系印度的历史，表达了对这种编年史学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批判：

不仅是欧洲的政治经济改变了印度的封建制度，印度的封建制度也同样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经济……殖民渗透不是单向的，殖民地对于大都会的反渗透是事情的另一面。<sup>⑥</sup>

殖民焦虑的、清教徒式的反面便是游牧民族推翻一个堕落的社会，正如威尔莫特·巴斯顿1921年所说：“一个毫无活力却有太多文明和奢华的生活方式的种族在一个过着简单生活的游牧民族面前的崩溃是历史时常重复出现的桥段之一。”<sup>⑦</sup>

① 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集》，吉尔伯特特编，第204页。

② 费恩·福特汉姆：《〈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普及和真实的H. C. E.》，见安德鲁·吉布森和赖因·普拉特编：《乔伊斯，爱尔兰和英国》，盖恩斯维尔：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8—211（202）页。

③ 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集》，吉尔伯特特编，第206页。

④ 见伊藤英四郎：“‘亚洲合众国’：詹姆斯·乔伊斯和日本”，载于理查德·布朗编：《詹姆斯·乔伊斯读本》，牛津：Blackwell出版公司，2008年，第203页。

⑤ “让两个男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的一个酒吧里与彼此交谈难道不是一件矛盾的事嘛？但是它又是一种表达一种强烈的冲突和不能化解的对立的理性和客观的方式。”（本文作者的翻译）雅克·默坎顿：《詹姆斯·乔伊斯的时间》，巴黎：L'Age D'Homme出版社，1967年，第23页。

⑥ 希拉·辛格：《高贵地表述，乡野地抵抗，建立国家》，社会运动研究，2/2，2003年10月，第223页。

⑦ 威尔莫特·布克斯顿：《世界简史》，第9—10页。

其次,乔伊斯对语言变化和混杂的语言类型很有兴趣,这一类型的语言有时在国际贸易的交汇中产生,它的增多很明显标志了一种全球化的未来。洋泾浜语言为乔伊斯的巴别塔式的相遇提供了一种模式,这种相遇既内在于也来源于他的“全球想象”。《芬尼根的守灵夜》推进了对文学方言戏拟可能性的探索,混杂语言的使用颠覆了发现这种语言时其中包含的种族标记。第485页上的(“我不是盎格鲁的后代,我说黄人的语言”)和第89页(“确确实实”)都是典型的乔伊斯对中国的文学方言的展示。<sup>①</sup>舞台上的中国人与爱尔兰人相近,他们如同戏剧家布希考特的主角,即使是带有偏见的,也成功地迷惑了英国讯问者的理性企图,为了捍卫真理,在傻瓜面前装傻。《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这种总是转瞬即逝的腹语策略性地指出这一时刻的舞台表演性,以及文学语言的人工构造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乔伊斯想要这些种族印记彻底消失:文学方言中非标准形式的程式化有效地制造了被选择的各类话语之间的坡度和距离,这些话语被强制性地彼此亲近。在这些不同的话语之间移动,喜剧和颠覆可以流动和跳跃,文学方言对于《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喜剧和颠覆主题至关重要。

第三,书中的场景表现了有关世界观的现象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表面不同、内在同一,这些现象学于是可以被绘入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地图,或者实际上,同一的地图中。根据黑格尔的东方学传统,宇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础(LPH 69)。在黑格尔的时代,有一种说法声称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的系统与斯宾诺莎的系统相似,这种说法困扰了黑格尔。乔伊斯重复了这些说法,显示他的道家“先知”的视野与伯克利的“无物质主义”之间的联系。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和统一被认为是哲学和意识形态上有关中心和边缘、帝王和平民、实践和理论、矛盾双方辩证冲突的象征。

第四,与此相关,乔伊斯对比较性超历史分层的使用因“轮回”方法而合理化,在这里古代的冲突思想(清教徒对基督徒)可以重新出现在更近代的冲突(中国人对日本人)中。正如乔伊斯所说,作为一种“巨大的冲突,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抗,都柏林酒吧里关于观念的争论代表了文明的碰撞(东方和西方)、民族的碰撞(中国和日本,或者爱尔兰和英国)、种族的碰撞(凯尔特和不列颠,“中华名族”和“大和民族”)、文化的碰撞(神秘的和实际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碰撞(孤立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如格蕾丝·埃克利注意到的:“这些邻近的国家处于哲学和政治、大陆和岛屿的战争中,也为英国和爱尔兰提供了一个东方对等物。”<sup>②</sup>带着对文学方言的矛盾性使用,这可能颠覆了,但也同样支持了乔伊斯在维柯和黑格尔的作品中发现的文化差异和历史形态的神话。乔伊斯将会多次进行这种表演,重复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冲突,比如,将这种冲突并入拿破仑与惠林顿的冲突中:

这个涉及面更广的事件预先重复了它自己。这一对(不论是拿破仑与惠林顿交战或者德·里兹克企图侦查巴克利夫将军,人们也许会说),明显地挣扎了很长时间。

(FW, 81. 32—81. 36)

拿破仑变成了“一个日本人”,一个英雄(如同战士肖恩),惠林顿吸收了“道”的概念,一

<sup>①</sup> 见赖因·普莱特在《“展示种族”:乔伊斯,种族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第121—145页。

<sup>②</sup> 格蕾丝·艾克利:《对光明日的期待:第四本,第一章》,见麦克·H. 孟加拉和弗里茨·塞恩编:《〈芬尼根的守灵夜〉导读》,大学公园:宾西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224页。



种当代的自我流放的形式(与闪相似)。对这些相遇的预期结果被系统地颠覆了,乔伊斯所说的“客观表述”也同样颠覆了这些预期结果的代表性地位。“预先重复”听起来像“再重复”,一种再做一遍之前修正做过的事情的企图,它本身就是对先前表演过的原创事件的一种重复。但是因为它是“预先重复”的,它对已经发生事件的重复,应该发生在这个原创事件之前。这概念也许与“*répétition*”(法语中“排练”)更相近,事件在它的最终形式出现之前不停重复,展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上演一出还未被写好的戏,意味着一种与真实和一些从未实现的表演的理想之间的延迟关系。实际的相遇于是永远是理想的,仅仅在它的陈述中“预先重复”过,从来不存在一次最终的表演,因此,实际上也没有首次或者连续重复过。《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种族或其他冲突仅仅是对历史叙述认为的确定事件的排练,然而这些事件却永远无法精确地确定形态。

## 世界历史里的中国

乔伊斯在他的老朋友庞德和叶芝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对于远东文化的思考。不过,这种思考也反映出中国在世界史中是一个分裂的存在。17世纪耶稣会士的报告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为重写世界史提供了动力,因为在这之前的世界历史主要关注近东,认为近东是文明的发源地——正如博须埃1681年开创性的著作《宇宙历史》所言。中国在世界史中常与以下三方面相关(或归类于以下三方面):中国文明的早熟和持续性,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隔绝和她相对停滞的发展。中国人的种族被认为是“蒙古人”或黄种人的一部分,但他们在1922年也同样代表了这一分类中的一个特例:“黄种人”也许处于一种“野蛮或原始的文化阶段”,而“中国人、印度支那人和日本人多少是非常重要的例外”。<sup>①</sup>

## 维柯和中国象形文字

维柯也许不是现代主义的世界史学家,但与黑格尔一样,他是在现代主义时期讨论世界历史类型的关键人物。因为他们与乔伊斯的特殊关联,我将把他们作为现代主义的重要部分来关注。

维柯是将有关中国的新内容整合进普遍历史的理论的前驱者之一。他认识到自己是在“中国人带着一种贸易优势的眼光,最近向我们欧洲人打开国门”<sup>②</sup>的时刻来写作的。他广泛阅读了耶稣会士的笔记和关于中国的含义的二手资料,他的《新科学》能为上文提及的三种联系提供坚实的根据。关于中国的内容甚至也许促进了维柯的理论的产生,因为他的理论主要在解释已知中国的一切,来描绘虽然处于不同时代,却有着相似历史阶段的历史进程中的异族的来临。他论证说,中国的发展停滞在埃及的阶段,理由是中国人对象形文字的使

<sup>①</sup> 韦伯斯特:《世界历史》,第21页。

<sup>②</sup> 詹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第三版,T. G. 伯金、M. H. 菲斯克译,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1948年,第303页,此后引为“NS”。

用。书写系统被看作民族个性和能力的标志：不同的种族在不同的时代发展出相异的书写实践。1922年，阿尔弗雷德·巴尔顿以社会主义的视角写了一部世界史，小心翼翼地展示了他对书写实践与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想法：

中国在8世纪所达到的文明就已经类似于18世纪的西方文明的水平，在这以后却没有明显的进步，其中的原因很难解释，H. G. 威尔斯认为，主要是中国繁复的语言使得阅读和书写的习得变得非常困难，以至于学习了古代经典的知识阶层已经没有精力去创新或创造，工商阶层更没有时间或机会去学习。<sup>①</sup>

了解了这个观点，有人会问那么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如何能被“非字母化”且有着“繁复语言”的人发明出来，甚至早于那些使用了一千多年“更为先进”的字母系统的人？

维柯关于中国汉字与古埃及文字相似的误解导致将中国人的世界观奇异化，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更接近于他提出的“诗性智慧”。这种异化的观念在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建立的中国汉字诗学中延续，也同样影响了庞德，后来被乔伊斯批判性地利用。

自然中不存在真正的名词和孤立的事物。事物仅仅是终端，或者是运动的接口，动作的十字截面，简单的印象。同样，也不存在纯粹的动词和抽象的运动，眼睛将名词与动词视为同一：运动是事物的运动，事物是运动中的事物，所以，中国的概念倾向于表现。<sup>②</sup>

在《意象主义宣言》中，庞德认为通过阅读和使用中国汉字，他可以更接近“事物本身”。在一篇有关中国诗歌的论文中，庞德补充说：“中国诗歌‘非常凯尔特式’”，“我发现叶芝先生提出过一个关于安瑞岛人的相似故事”，于是，中国书写系统决定了另外一种中国人的世界观，这是另一种异域的、民间的凯尔特（和他们的薄暮）。但是，正如钱兆明的观察：“费诺罗萨对于中国书写语言图画性的赞赏是荒谬且误导的。”<sup>③</sup>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也指出了庞德-费诺罗萨的诗学的缺点：“如果我们‘口头地’看待它，也许在生动的自然中不存在真正的名词，万事万物都变成了混沌的眼球。”（FW, 523, 10—12）按伯克利的理解，中国再次与一种空想的认知方式联系起来。乔伊斯用“口头地看”来嘲笑费诺罗萨的逻辑，显示出费诺罗萨“通过文字”而不是“通过眼睛”来观看世界的局限。中国用“馄饨”，一种被认为是分开的“眼球”的汤饺暗示了发音相似的“混沌”。每个人都在变化，转变为眼睛。乔伊斯借用费诺罗萨的“自然”，在斯宾诺莎“自然的自然”的基础上，创造出“动态自然”，创造出自然的统一的神。自然中“每个生物都在转变”，如果我们将这些活动理解为“名词”的对应，“事物”则不能严格存在。并且当每种存在都呈现出对自身的吸引力，在它自己的眼中，“转变”为自身，名词—事物也不能存在。在它们眼中，自己总在发展，永远在“转变”，没有停顿。这种关于动态自然的视角并不是在论述语言的缺陷，而是为了反映出—个没有休息与静止的世界。

① 巴尔顿：《给劳工的世界史》，第97页。

② 引自埃兹拉·庞德：《早期作品》，伊拉·纳德尔编，纽约：Penguin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③ 钱兆明：《东方主义和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姆斯作品中的中国传说》，北卡罗来纳州德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维柯甚至从中国绘画中推断出埃及绘画的样子：“我们可以推断出埃及人与现在的中国人一样缺乏技术。”(NS,46)正如中国被隔绝了一样，埃及也一定如此。维柯用这种与真实的隔绝来解释神话传说里中国人傲慢地相信他们自己伟大遗产的原因，这种信念即使与希伯来真理接触后也同样没有改变。(NS,32)因此，通过对中国和埃及的比较，维柯提出了国家进步需要特殊力量的阶段论。这种比较与乔伊斯对当代中国与古代爱尔兰的的超历史的分层类似。

## 黑格尔与凤凰

维柯将中国发展的停滞不前归罪于儒家的著作，认为它们“如同埃及人的僧侣书一样，对物质自然的提及是原始和笨拙的……几乎全部转向庸俗的道德准则，也就是说，道德如同自然法则一样约束着人们”(NS,50)。黑格尔重申了这一点：“对中国人而言，他们的道德法则如同自然法则——外在地、积极地控制他们——中国人声称道德法则是在暴力、强制责任和对彼此的尊敬的基础上建立的。”(LPH,74)道家也成了黑格尔的批判对象，这是维柯没有考虑的，因为直到1788年，维柯死后的45年，《道德经》才被翻译成拉丁文。对道家的发现和解释标志了西方对中国建构的重要进展。在黑格尔的时代，关于道家的一个典型的(误导的)观念是“它对世界上的事情漠不关心”<sup>①</sup>。于是，道家的服从本能和对知识理性的弱化也许与中国的文化停滞和历史循环思想相一致。对黑格尔而言，“自然的”道德法则证明了中国如同印度一样“完全缺乏对自由观念的本质理解”(LPH,74)。自由的缺失表明这两个国家无法回应“追求完善的冲动”，或者无法依据任何“转变辩证”的关联来建立一个不断进步的、最终成为同一的整体。(LPH,56,59)于是，黑格尔将中国划分在以种族为界的“亚细亚”范围内，这也将保留在西方的思想和精神中。

黑格尔使用了乔伊斯熟悉的意象来说明这种差异，这种修辞也可以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找到：

在轮回的观念中，我们发现(再循环的观念)在它与个体存在的联系中发展。但是，一个更广为人知的传言表明，凤凰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类型；它永远为自己准备火堆，然后飞入火中燃烧自己，但却从它躯体的灰烬中产生出新的、再生的新鲜生命。但是，凤凰这个意象不仅是亚洲的，它不仅是东方的而且也是西方的。精神……不仅仅……从它先前形体的灰烬中焕然一新；它也来自于一种光荣的、纯粹的、升华了的精神。它显然与自我对抗——消耗自我的存在；但是在毁灭中又产生出一种新的存在形式，每一个连续的阶段转变为一种具体的实在，努力将自己升华到一个新的级别。(LPH 76)

中国历史给黑格尔的系统造成了一个难题：在它早熟的文明中，中国肯定曾经已经“将自我提升到了新阶段”，但是从未有过一种“精神”将它带领到那里。中国的先进是技术上的，但绝不是道德和精神上的。只有在西方才有精神的进步，而且仅仅是通过暴力来实现

① 亨瑞·艾利斯：《晚期驻中国大使的进展》，伦敦：John Murray 出版社，1818年，第二卷，第293页。